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睡虎地秦简所见

秦代国家与社会

〔日〕工藤元男 著

〔日〕广濑薰雄 曹峰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睡虎地秦简所见
秦代国家与社会

〔日〕工藤元男 著

〔日〕广濑薰雄 曹峰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日)工藤元男著; (日)广濑薰雄, 曹峰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1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5668 - 7

I. ①睡… II. ①工… ②广… ③曹… III. ①云梦竹简—竹简文—研究②古代史—中国—秦代 IV. ①K877.54②K23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8791号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

[日]工藤元男 著

[日]广濑薰雄 曹峰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337,0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978 - 7 - 5325 - 5668 - 7

K·1315 定价: 3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朱渊清、陈 致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渊清

[美] 李 峰

[英] 汪 涛

[美] 张立东

陈 致

[日] 高木智见

唐际根

曹 峰

丛书序

“早期中国”是西方汉学(Sinology)研究长期形成的一个学术范畴,指汉代灭亡之前(公元 220 年)的中国研究,或是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研究,此一时期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体系。以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教授于 1975 年创办 Early China 杂志为标志,“早期中国”这个学术范畴基本确定。哥伦比亚大学近年设置的一个常年汉学讲座也以“早期中国”命名。

“早期中国”不仅是西方汉学研究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实用分类,而且是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实质性概念。

从最初的聚落发展到广大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帝国建立,并且在汉代走上农业文明之路、确立起帝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完善科层选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标准,早期中国经历了从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早期中国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孕育、塑造了此后长期延续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编户齐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稳定维系;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低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汉化,帝国疆域的扩张主要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结果;各种宗教基本不影响政治,世俗的伦理道德教化远胜超验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导的价

价值观体系以及由此造就并共同作用的强大的官僚制度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等等。追源这类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历史选择形态(动因与轨迹),对于重新审视与厘清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历程,乃至重新建构现代中国的价值观体系,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期中国研究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研究重心,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学术研究中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国研究在中西学术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这就是:扩充研究资料、丰富研究工具、创新研究技术,多学科协同不断探索新问题。

1916年,王国维以甲骨卜辞中所见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一一对照,发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绝大部分出现在卜辞中。王国维把这种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证的研究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出土文献资料在现代的早期中国研究中显示出越益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 100 年来约出土 15 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 34 844 片。青铜器铭文,1937 年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金文总数 4 831 件,其中绝大部分为传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录资料到 1988 年止,共著录了金文 11 983 件。此后到 2000 年,又有约 1 350 件铭文出土发表。最近二、三十年,简帛文献资料如银雀山简、马王堆帛书、定州简、阜阳简、郭店简、上博简等都以包含大量古书而深受关注。

严格地说,王国维说的地下材料,殷墟甲骨、商周金文都还是

文字资料,这些发现当时还不是考古发掘的结果,研究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考古学提供的是另外一种证据。傅斯年提倡“重建”古史,他主张结合文献考证与文物考证,扩充研究“材料”、革新研究“工具”。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立刻开始发掘殷墟。傅斯年在申请发掘殷墟的报告中说:“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从1928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37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地点共11处,总面积46000余平方米,这15次发掘收获巨大:在小屯北地发掘了53座宫殿基址。在宫殿基址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甲骨。在小屯村北约1公里处的武官村、侯家庄北地发现了商代王陵区,发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东南约1公里处的高楼庄后岗,发掘出了仰韶、龙山和殷三种文化层的叠压关系,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三种古文化的相对年代。在后岗还发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区,如大司空村等地还发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王陵的科学发掘举世震惊。中国考古学也从开创之初就确立了鲜明的为历史的特色和风格。为历史的中国考古学根植于这块土地上悠久传承的丰富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积淀,强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终支撑着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近5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就,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城址还是商周墓葬的发掘,都是早期中国文明具体直观的展示。

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检核,不同属性的资料相互印证,提供我们关于早期中国更加确切更加丰富的信息,能够不断地解决旧问题提出新问题,又因为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而探寻无限更多的资料,而使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的认识不断深入愈益全面。开放的多学科协同的综合研究使早期中国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其他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来说,早期中国研究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或

许也有其可资借鉴的意义。

王国维、傅斯年等人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和知识的接受者传播者,他们的古史研究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学和中国学术的新时代。现代中国学术的进步始终是与西方学术界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传播紧密相联的。西方早期中国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文明起源研究、官僚制度研究、文本批评研究等等,启发带动着中国同行的研究。事实上,开放的现代学术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识背景学者的不断交流、对话中进步。我们举最近的一例。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的一个重要基准点是确认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 899 年,这是用现代天文学研究解释《竹书纪年》“天再旦于郑”天象资料的一项成果。这项成果的发明权归属韩国学者,在断代工程之前西方学界已确认了这个结论。将“天再旦”解释成日出前发生的一次日全食形成的现象的假说是中国学者刘朝阳在 1944 年提出的,他和随后的董作宾先生分别推算这是公元前 926 年 3 月 21 日或公元前 966 年 5 月 12 日的日食。1975 年韩国学者方善柱据此假说并参考 Oppolzer 的《日月食典》,首次论证“天再旦”记录的是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的日环食(《大陆杂志》51 卷第 1 期)。此后,1988 年美籍学者彭颀钧、邱锦程、周鸿翔不仅也认定“天再旦”所记是公元前 899 年的日环食,并对此次日食在“郑”(今陕西省华县, $\lambda = 109.8^{\circ}\text{E}$, $\varphi = 34.5^{\circ}\text{N}$)引起“天再旦”现象必须满足的天文条件,第一次做了详尽理论分析和计算,并假设食甚发生在日出之时,计算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转变化的相应的 ΔT 为 (5.8 ± 0.15) h,将天再旦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夏商周断代工程再次确认了“天再旦”这一成果,并为此于 1997 年 3 月 9 日在新疆北部布网实地观测验证。

本丛书不仅是介绍西方学者一些具体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成

果,引进一些新的概念、技术、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个开放性的不断探索前沿课题的学术交流对话的平台。这就算是我们寄望于《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的又一个意义。

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通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时刻,愿《早期中国研究》丛书能够坚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欢迎所有建立在丰富材料缜密分析基础上、富有独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国研究著作。

著述和出版是长久的事业,我们只要求自己尽力做得更好一些。希望大家来襄助。

朱渊清

2006/12/2

写于学无知室

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

我的论文集借助曹峰先生、广濑薰雄先生之力，有机会译成中文，我感到无比高兴。而且，此书是在中国最有名的出版社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于我是极其光荣的事。借此机会，我对自己为何要撰写这部论文集再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真正投身睡虎地秦简研究，是在进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之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国相继出土了银雀山汉简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简牍资料，在日本也引起关注，一般日本人对其关心度也很高，报纸曾在第一版予以大幅介绍。尤其是1975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想其原因在于，对秦汉帝国的形成过程及其性质特征的研究，是日本战后东洋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以东京大学西嶋定生先生、早稻田大学栗原朋信先生为代表，许多学者竞相在此领域作出了出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1970年岩波书店刊行的《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第4卷“古代4”可以得到反映（以下简称《讲座》）。我们这些1950年前后出生的人，进入大学后，先读《讲座》，然后有志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不在少数。然而，《讲座》刊行的年代，还在70年代出土文字资料出现以前，因此，除了过去已经发现的居延汉简等资料外，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依据传世文献

史料得出的成果。就在这部总括战后东洋史学成果的《讲座》刊行后不久,报道了睡虎地秦简出土的消息,因此,我们对这批资料的期待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睡虎地秦简的问世,是揭开了利用出土文字资料展开新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帷幕,恐不过分。

睡虎地秦简这批新资料出土后,或许中国学界也是如此,日本的学界掀起了一股秦简研究的热潮,我就是急切投身其中的一人。当时,日本的大学中,好几个睡虎地秦简研究会纷纷成立,有不少人在学术研讨会上以秦简为主题作研究报告。我进入研究生院后所作第一个研究报告《睡虎地秦墓竹簡にみえる内史について(睡虎地秦墓竹簡所见的内史)》(第76届史学会大会东洋史分会场,1978年11月12日),就是这种学界潮流的产物(已收入本书第一章)。接着我又发表了《睡虎地秦墓竹簡よりみた都官について(睡虎地秦墓竹簡所见的都官)》(第78届史学会大会东洋史分会场,1980年11月9日,已收入本书第二章)。当时我对睡虎地秦简的研究,集中于以秦律为中心的和法制资料相关的领域。有的人利用这些新资料,是要证明他们自己依据传世文献构建起来的历史形象。而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一辈,是想以此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对过去的学说作出批判性的检验。就这样,对于新资料的反应因年龄而有所不同,但大家的研究对象都集中在秦律等法制资料上,这是唯一的共同点。

睡虎地11号秦墓不仅出土了法制资料,还出土了称为《日书》的占卜书。对于这部《日书》,日本的历史学者多不太关心,我自己最初也是如此。我开始关心《日书》,是因为池田温教授主持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律令制研究会”上,和大栴敦弘先生(现为高知大学教授)一起负责研读《日书》。这成为我深入探究《日书》的契机,研究对象从秦律转换到《日书》。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考虑的问题是,能否建构起一个可以同时讨论秦律和《日书》的共通的

“场”。过去对睡虎地秦简的使用方法,过分集中于秦律等法制资料,研究《日书》者仅限于古文字学或思想史方面的人。然而,既然是同样出土于11号秦墓中的简牍资料,那么彼此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关系,应该存在着可以通观睡虎地秦简全局的视角。我在此采用的是Annales(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法。就是说,在秦占领统治下的南郡这块区域,统治者秦和被占领者楚是如何对峙的?秦法是如何渗透到楚的基层社会中去的?或者说,由于受到习俗的抗拒,秦法被迫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历程?我设定了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通过“法和习俗”的视角来展开讨论。我进而试图对生存于基层社会的人的心性作出分析,对他们日常的精神世界作出可视化的尝试。这样的尝试是否成功,还有待于读者的判断,但至少还没有人依据这样的方法论、从这样的视角去分析睡虎地秦简,我想,这就是本书对学界作出的一点贡献。

现在,我以过去的睡虎地秦简研究为基础,在习俗方面作更进一步的探索,尤其以产生出“日书”的社会背景为研究的方向。目前,最早的“日书”可以追溯到九店楚简,以此为界限,更早的楚墓中随葬的是卜筮祭祷简。至今为止,我用中文发表的、论述从“卜筮祭祷简”向“日书”转变之过程的论文,主要如下所示:

1. 《从卜筮祭祷简看“日书”的形成》,《人文论丛》特辑(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2. 《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的构造与系统》,《人文论丛》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3. 《“卜筮祭祷简”所见战国楚的王权与世族、封君》,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4. 《楚文化圈所见卜筮祭祷习俗——以上博楚简〈柬大王泊旱〉为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5. 《平夜君楚简“卜筮祭祷简”初探——战国楚的祭祀仪礼》，《简帛研究二〇〇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6. 《从地域文化论的观点考察“楚文化”》，《珞珈讲坛》第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7. 《社会史研究与“卜筮祭祷简”、“日书”》，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9月。
8. 《从九店楚简〈告武夷〉篇看“日书”之成立》，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

这些研究成果没有收入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是，利用随葬于战国楚墓的“卜筮祭祷简”考察“日书”的生成过程。这表明，“日书”是从楚文化圈中诞生出来的。

与这项研究的展开相前后，又出土了王家台秦简“日书”、岳山秦墓木牍“日书”、周家台秦简“日书”等秦的“日书”，以及张家山127号汉墓竹简“日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汉简“日书”、虎溪山汉简“日书”、孔家坡汉简“日书”、杜陵汉墓木牍“日书”等等汉代“日书”，为此我们需要讨论战国、秦代的“日书”进入汉代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使我们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此，究竟什么是“日书”再次成为一个问题。这些占卜资料被称为“日书”，是因为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简末背面墨书有“日书”二字。现在，虽然各种各样被视为“日书”的资料在不断增加，但确实可以称为“日书”的，只有附带“日书”篇名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严格说来，其他的各种资料只不过因为和睡虎地秦简“日书”相似，而被认定为“日书”。因此，重要的是，需要将这些占卜资料和睡虎地秦简“日书”作出严密的比较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讲，从内容的构成、篇名的类似看，最应予以注目的是孔家坡汉简“日书”。关于这批资料，我以《“日书”所见地域文化与中国文明》为题，申请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补助金基盘研究(C)并获得批准，是2007年度～

2010年度正在实施中的研究项目。

为了将秦律和“日书”所见秦代法和习俗的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汉代加以考察,我将研究深入到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和“奏谏书”。这个领域得到武汉大学陈伟先生和荆州博物馆彭浩先生的帮助,利用红外线相机拍摄相关资料,以电子数据为基础,三方共同出版了新的文本,那就是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的《二年律令与奏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已发表了《中国古代の“日書”にみえる時間と占卜—田律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古代“日书”所见时间与占卜——以田律的分析为中心)》(《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都市史学)》第5号,2009年12月)一文。

虽然本书原版刊行至今已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学术重心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而作为分析对象的相关资料有了更多的增加,今后,通过加入这些新的资料,我期待着能够有机会出版一部具有新内容、新高度的《中国古代的法与习俗》。

工藤元男

2009年12月14日于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所

凡 例

一、本书所参照的睡虎地秦简的版本如下所示，共有四种：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线装本七册，文物出版社，1977年。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③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精装本，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文物出版社，1990年。

二、本书所采用的简号来自具有整体编号的版本③。版本④以篇为单位设置简号，本书最后设置有版本③和版本④的对照表，可以参照。

三、本书称版本③的释文为“旧释”，版本④的释文为“新释”。

四、整理小组制定的原文和白话译，笔者依据的是版本②和版本④，两者没有差异时依据版本④。

五、原简的错字用〈 〉表示，但二字以上的错字、倒文，在划线之后，也将正确字句用〈 〉表示，将原简的异体字、假借字读为通行文字时，在原字后用（ ）表示通行文字。

六、原简有脱字时,用【 】表示补字。有断简时,用☐表示断简。

七、原简的重文、合文,特别是在引用原文时,在该字右下附加“=”的符号。

八、“|”、“レ”、“●”、“■”等符号,均为原简自身的符号。

九、笔者释文中,据意增补之处,用[]表示。

目 录

写在中文版出版之际	001
凡 例	001
序 章 睡虎地秦简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001
第一章 内史的改组和内史、治粟内史的形成	018
前 言	018
第一节 睡虎地秦简所见内史的问题	019
第二节 睡虎地秦简所见内史的结构	023
第三节 内史的变迁与改组	032
结 语	042
第二章 秦的都官和封建制度	050
前 言	050
第一节 以往的研究及其问题	051
第二节 秦简所见都官的结构	055
第三节 都官设置的历史背景	062
结 语	068
第三章 秦的领土扩大与国际秩序的形成	073
前 言	073
第一节 秦的属邦与道制	074
第二节 西汉的属国与道	079
第三节 东汉的属国与道	084